

#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1979年2月10日 星期一 第六版  
农历己未年正月十四 第11173号

## 财政部确定并规定实施办法

# 进一步减轻农村税收负担

新的减免税收措施实施后，预计全国农村每年将增加收入十亿元以上，这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改善农民生活，将起到积极作用

新华社北京二月九日电 财政部最近确定，从今年起进一步减轻农村社队的税收负担，并规定了实施办法。实施办法已经国务院批准。预计全国农村每年将因而增加收入十亿元以上。

新的减税办法规定，从今年开始，农村社队企业工商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将由原来的六百元提高为三千元，在起点点以下的一律免税，税率仍按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征收。新办的社队企业开办初期纳税有困难的，原规定除生产烟、酒、棉纱等高税率产品的除外，可免征工商

税、所得税一年至二年，现在规定可免征二年至三年。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区（旗）的社队企业，免征工商所得税五年。目前经济条件仍然很困难的革命老根据地（如陕北等地），需要对社队企业免征工商所得税的，可由各省、自治区报国务院批准实行。为了总结经验，少数省对社队企业所得税实行四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的，仍继续试行，起征点也改为三千元。

在农业税方面，凡属粮食产区低产缺粮的生产队，每人平均口粮在起征点以下的，免征农业税，农村

各地农业税的起征点，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原则，按照国家确定的口粮标准及有关要求作出规定，报国务院审批。对于经济作物产区、城市郊区的生产队，凡是收入较高、口粮由国家供应、过去农业税一般征收代金或经济作物的，今后要继续征收。

我国农村的税收负担一向比较轻，一九七七年农村征收的工商税、农业税仅占农村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三五。新的减免措施实施后，农村

税收负担将进一步减轻。这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改善农民生活，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叶委员长电贺沙德利当选阿尔及利亚总统

新华社北京二月九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二月九日打电报给本、杰迪德、沙德利，热烈祝贺他当选为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电报全文如下：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本、杰迪德、沙德利阁下：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本、杰迪德、沙德利阁下：在阁下当选为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的时候，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谨向阁下表示热烈的祝贺。祝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以及在建设自己国家的正义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阿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 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

华总理致电平托总理祝贺中葡建交

新华社北京二月九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打电报给葡萄牙共和国政府总理莫塔·平托，热烈祝贺中葡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电报全文如下：葡萄牙共和国政府总理莫塔·平托阁下：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葡萄牙共和国建交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葡牙政府葡牙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中葡建交在我们两国关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我相信它必将成为中葡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良好关系的进一步展开并开辟广阔的前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于北京

## 王震同志接见云南知识青年代表 勉励青年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立志建设边疆

编者按：去年年底，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代表丁惠民等同志来到北京，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当地国营农场存在的问题。一月四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同志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同志接见了丁惠民等同志，勉励他们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殷切期望他们立志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同时严肃地指出了国营农场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改进。王震同志的讲话，深深地教育了丁惠民等同志。他们回到云南以后，给王震同志发来电报，表示坚决听从党中央、华主席的指挥和安排，决心为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工作。现将王震同志的讲话和丁惠民等同志的来电摘要发表，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定会从中受到教育。

王震同志说：我们这些人还要拚着仅有的余生为四个现代化尽一份力量，还是不是为了祖国的子孙后代？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还说，世界是你们，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就是为了让大家好好干事情。这就需要安定团结。我们两个老头子（指自己和程子华同志）对你们讲清楚，请你们这些青年人要必须关心国家大事，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维护正常秩序，以便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王震同志说，要把国家建设得富强起来，我们还有很多困难。对现状，我也很不满意，有内忧外患嘛！我们国家还很穷，邓小平同志经常讲，想办法把人民的生活改善得快一点。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候，你们闹，影响不好。你们闹事，对不对嘛！你们要转过来，作自我批评，行不行？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讲了，决不追究你们，但是回去要作自我批评。今年是粉碎“四人帮”后

三年大见成效的一年，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都要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如果你们能这样做，坏事就能变成好事。王震同志说：我们准备组织慰问团，组织家属代表到垦区农场去慰问，看看你们。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已经到你们那里去了。王震同志还说：最近越南背信弃义，投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那一边，搞霸权主义，进攻柬埔寨，也进攻中国边境，在这种情况下，边境地区更要安定团结，搞好生产。这十几年农垦也被搞乱了，人增加很多，生产没有增加，橡胶树还是过去的那些。要依靠你们大家努力，把生产搞好。

当谈到知识青年的婚姻问题时，王震同志说：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从前天打伏，那里顾得上结婚？有不少同志都是三十多岁才结婚的。象贺老总、陈老总、彭老总，都是三十多岁了才结婚。王震同志说：你们那里，周恩来同志、贺老总、陈老总都去过。你们要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好，把猪圈养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就是现在这时候也能有茄子、辣椒吃。我也在北师大过春节，也在你们动棚那里过过春节。你们那个地方，我看很好，气候也很好，澜沧江有很大的水力资源，可以发电，还有铜矿、铁矿等等。真正搞起来，不是一个落后的地方。

（下转第四版）

## 听党的话为实现四化奋发努力

云南知青代表丁惠民等同志给王震同志来电

国务院王震副总理：

一月四日，您接见我们知识青年代表，深切地体现了党中央、华主席对我们青年人的关怀。您的谈话进一步表达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

说实话，当时我们对您讲的话不十分理解，认为有些地方批评得重了。所以，回去后大家心里闷闷不乐。晚上，当您传达了华主席、邓副主席的指示后，我们的思想情绪才稳定下来。我们全体代表连夜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一致认为虽然知青问题是重要的，但在全国这盘大棋上它还不是小局。小局要服从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局。因此，不论我们知青问题如何解决，既然中央有了明确的指示，那么我们在行动上必须听从党中央、华主席的指挥和安排。对我们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要求，相信党中央一定会给予妥善解决。因此，大家一致决定，马上返回农场，尽快把党中央对我们的谈话精神带回去，迅速贯彻落实。

回到云南后，我们全体代表分头到本单位向广大青年传达了您的讲话和国家农垦总局的有关文件，并主动解散了当初我们成立的组织，配合农场党委和中央调查组做了工作。目前，除个别单位，局势基本上稳定下来了。但是，存在的问题还很多，还有一些单位没有复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决心在党的

领导下，继续做好工作，请党中央放心。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二个月所走的道路，所做的一些事，心中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是在罢工问题上，因为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的多，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考虑的少，所以，当时由于个别领导同志的一些不妥做法，我们就耐不住了，热血上冲，不管三七二十一，草率决定用罢工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虽然我们当时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实际上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影响和干扰了安定团结局面。您和程子华同志批评了我们，是对我们的爱护和关怀，是为了不让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以免做出对国家、对人民不利的事来。现在，我们在事实面前从内心认识到是我们做错了。上次您对我们的批评，不是重了，而是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教训，作为鞭策自己今后努力工作的动力。请党中央原谅我们，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以前的错误。我们全体青年向党中保证，一定在今后的工作劳动中，为祖国早日实现四化而百倍地奋发努力。

云南省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  
上海知识青年、共青团员  
丁惠民 胡建国 刘光国  
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三日

## 下乡知青要做维护安定团结模范

上海市委召开电视广播大会号召：

上海市委遵照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从上海的实际出发，采取落实措施，正在给上海下乡知识青年做大量的工作。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凡是上海出去的，曾经到农村落户的，包括已分配在外省工矿、企业工作的，不管什么情况，都要调回上海。特别是春节以来，有极少数人竟然在闹市中心堵塞交通，损坏公物，甚至冲击机关，打骂干部，阻拦火车，已造成了严重后果。

严佑民同志在会上说，林彪、“四人帮”及其余党横行的十年，给上海的破坏是极为严重的。光是在下乡知青问题上，所造成的损害，带来的困难，遗留下来的问题就是很多很多的。现在要完全解决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还要花费时间，这需要一个过程。对群众提出的要求，凡是合理的，我们一定要切实负责，按照党的政策，根据目前的可能，统筹安排，有计划有步骤地尽快解决。对少数人提出的不合理的要求，我们一定要耐心地解释和说服，不作无原则的迁就。

严佑民同志说，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现在和今后，都要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畅通各种民主渠道，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切实改进工作，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同时，我们相信人民群众也会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自觉地用无产阶级纪律来约束自己，不会离开生活的基本原则去谈民主自由，不会离开发展生产去谈改善生活。

严佑民同志说，上海历来肩负着从人力上物上支援内地和边疆的光荣任务。过去这样做是对的，今后还要坚持这样做。解放以来，上海输送了大批人才到全国各地去，他们长期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对当地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受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赞扬。这是上海人民的光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光荣传统，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为加快全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上海市总工会、共青团上海市委和民政部门，街道里弄，这些天也都召开座谈会，教育青年们继承发扬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革命传统，胸怀全局，志在四方，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 高举民族民主爱国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



柬埔寨人民抗越卫国战争的烽火正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柬埔寨革命军和广大人民正在自己神圣的国土上英勇抗击入侵之敌。一场抗击越寇的持久的人民战争已经开始。

一个多月前，越南反动当局仗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悍然向民主柬埔寨发动了闪电式的武装进攻。它出动几十万正规军和大量飞机、坦克，占领了柬埔寨首都金边以及许多城镇和交通要道。柬埔寨人民蒙受巨大的灾难，遭到暂时的挫折。但是，侵略者只能逞凶于一时，得势于一城一地，广大的农村、山区和丛林地带仍然在柬埔寨爱国人民手里。柬埔寨革命军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依托有利的广阔天地，开展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越南侵略者困守一些点线，被动挨打，陷入了泥潭。

柬埔寨人民抗越越南侵略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历史的紧急关头，在大敌当前，民族存亡的严重时刻，民主柬埔寨政府于今年一月十一日发表声明，庄严宣布全体柬埔寨人民将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的、民主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同越南侵略者战斗到底。这一声明表达了柬埔寨人民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团结对敌的共同意志。民族、民主、爱国的统一战线战的伟大旗帜，已在光荣的柬埔寨上空高高飘扬，成为整个柬埔寨同胞仇敌、消灭入侵之敌的有力保证。

由于越南的武装入侵，柬埔寨的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妄图以武力征服、吞并整个柬埔寨，把柬埔寨变为它的殖民地附庸国。柬埔寨大片国土已沦于越南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柬埔寨民族的生存正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柬埔寨和越南侵略者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而柬埔寨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派别间的矛盾则降到从属的地位，变成次要和服从的东西。因此，根据新的形势，及时总结经验，调整政策，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爱国统一战线，就成为柬埔寨人民面临的迫切的任务。柬埔寨爱国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完全可以在抗越越寇、维护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神圣的民族使命的大前提下团结起来。这样的民族大团结，对于柬埔寨民族取得抗击越南侵略者的最后胜利，无疑地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下转第五版）



(一)

阎红彦同志离开我们整整十二年了。十二年来，云南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深深怀念阎红彦同志。

阎红彦同志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惨遭林彪、“四人帮”疯狂迫害，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饮恨而死的。当时，他担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粉碎“四人帮”后，阎红彦同志的沉冤才得以昭雪。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阎红彦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参加了仪式。

阎红彦同志是陕西子长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于一九二七年秋参加了清涧暴动，随后在陕甘和晋西地区进行武装革命活动，为创建西北工农红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阎红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几十年来，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英勇战斗，积极工作，立场坚定，爱情分明，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使云南的党组织和人民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对于阎红彦同志的最好悼念，就是认真学习他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他的优点很多，最为突出的是，他既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魄力，又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并善于把二者结合起来。他在主持云南省委工作的七、八年中，把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云南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动了全省工作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经过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到一九六六年以前，云南全省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团结、集体经济巩固、工农业生产发展、市场繁荣兴旺的景象。一九六六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六〇年增加三成，超过历史最高产量；经济作物有很大发展，平均每人有八斤糖，出口烟叶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畜牧业也高速发展，全省平均每二亩二分地有一头猪或牛或羊，猪羊的存栏数，占全国第四位，猪占六成。按人口计算，当时云南的猪平均每户二点零一头，占全国第一位。造林面积，一九六四年达到九十九万二千亩，相当于一九六一年的五倍。昆明和专县城镇市场繁荣，肉食、主要副食供应应。云南人民从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和物质利益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衷心拥护共产党，发自内心的拥护毛主席。提起那个时候，人们无不称赞。可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却诬蔑那个时候的云南省委是“黑省委”，“执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诬蔑云南十七年的工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谎言掩盖不了事实，云南解放后的十七年，是云南省委和各级党委、全省广大干部、干部坚持党的革命路线的十七年，是全省广大人民按照党的方针、政策进行革命和生产实践的十七年。尽管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党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红的，云南省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云南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而云南在文化大革命前八、十年中所取得的成绩，是和阎红彦同志的积极工作分不开的，特别是和他实事求是，从云南实际出发，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分不开的。这就是云南人民特别怀念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阎红彦同志主持云南省委工作初期，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尤其是农村，在“五风”的影响下，许多地方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忽视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原则，不适当地进行供给制，不顾条件地办公共食堂，不按云南农村，特别是山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以及多民族杂居的实际情况，把社队规模搞得偏大；取消了自留地和社员家庭副业，使农业生产遭到损失，使集体经济遭到破坏。当时，人民生活相当困难，甚至发生了浮肿病，边疆民族地区也一度出现动荡不安。

面对着重重困难，怎么办？由于多年来一味地盲目反“右”，不准提极左，有些人怕犯所谓“右倾”错误、“方向性”错误，不敢落实党的经济政策，不敢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而阎红彦同志却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决心，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云南的实际，坚决执行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他一方面派出大批工作组摸清情况，一方面召开有地、县委干部参加的分析会，端正思想认识。他一再向干部指出：“农民是剥夺不得的，价值规律、客观规律是违背不得的。”“只要真正接受了教训，知道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不是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而必须是实事求是，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一九六〇年，根据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十二条)云南省委开展了反“五风”的斗争，坚决划清“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特殊化风”一九六一年又根据《六十条》草案，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解决了公共食堂问题，调整了社队规模，正确处理了大集体、小自有的关系，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恢复了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整工作，生产关系比较适合当时云南农村的生产力状况了，党的经济政策比较落实了，农业生产迅速健康地向前发展了；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落实中央这一系列政策的过程中，阎红彦同志实事求是的作风，表现得非常突出。他遵循毛主席关于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的指示，坚决反对照抄、照转中央的指示，注意研究在执行过程

## 崇高的品质 求实的精神 ——云南人民深切怀念阎红彦同志

刘明辉 赵增益 李 原

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凡是在省委权限之内可以处理的新问题，都在阎红彦同志主持下，由省委做出了补充规定；凡是属于应由中央决定的，他就积极地向党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一九六一年上半年，中央已明确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但当时所说的“队”是指生产大队，耕牛、大农具都归大队所有。阎红彦同志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认为这种制度，不利于调动生产队的积极性。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他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正式建议：“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问题，还是归生产队所有为好。所谓大牲畜归大队所有，是‘只图虚名，而无实惠’，归生产队所有可以大大加强生产队的责任心和积极性，有利于大牲畜的恢复和发展”。关于社队规模问题，他针对云南地理条件复杂，山区幅员辽阔，居住分散，民族众多，当时的社队规模一般偏大的实际情况，在报告中说：“我觉得规模的大小，不能只看户数，更不能只看平均数，也不能完全拘泥于原来的乡和高级社的情况，必须考虑居住条件、经济联系、民族关系，该大就大，该小就小。”毛主席肯定了这个报告，在批示中写道：“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阎红彦同志善于把上级指示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勇于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反映客观实际的作风，贯穿在他的全部工作中，特别是贯穿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斗争中。云南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恢复，是伴随着调整人民公社体制、落实党的政策而来的。在“五风”盛行的那些年份，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方针遭到严重干扰，孤立地就粮食抓粮食，瞎指挥、“一刀切”的现象十分严重，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害。当时，最尖锐的问题仍然是粮食。由于连年减产，粮食产量最低的一九六〇年比最高年降低百分之二十多。阎红彦同志和省委坚持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优先的地位，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为了调动广大农民增产粮食的积极性，根据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阎红彦同志提出了粮食增产部分实行“三三制”的办法，即当年增产的部分，国家超购、集体储备、增加社员口粮各占三分之一。这一办法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

但是，阎红彦同志不是孤立地就粮抓粮食，一再强调要发展多种经营，把农、林、牧、副、渔结合起来，全面发展。他所以特别重视发展多种经营和山区生产，是和他对云南农业生产的特点的深入调查研究分不开的。他常说：“要研究自己的情况，什么能发展，什么不能发展。”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全省总面积三十八万多平方公里，一千五百亩以上的坝子(小盆地)只占百分之六，其余百分之九十四的面积都是山区和丘陵。云南的地势，山脉纵横，北高南低，河流深切，峡谷纵横；有海拔几千米的河谷，也有海拔几千多米终年积雪的高山；有热带、亚热带地区，也有高寒山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形成了独特的立体气候，带来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云南农、林、牧、副、渔的资源丰富，有宽阔的草场，宜于发展畜牧业；有丰富的森林资源，蓄积木材量当时占全国第二位；经济林木种类繁多，达二十余种。阎红彦同志一到云南就进行调查研究，逐步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第一手资料，对这些特点的了解越来越深刻，从而对于在云南必须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心也就越来越坚定。

阎红彦同志把因地制宜、全面发展农业生产提到了重要位置。他一再强调：“积极发展经济作物、经济林木，十分重视畜牧业，开展多种经营，要作为一个战略任务去进行。”又说：“增加收入，增加积累，巩固集体，增加工业原料，活跃市场，改善人民生活，都要靠开展多种经营”。为了促进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在阎红彦同志的倡议下，省委根据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对发展林业、经济林木、畜牧业、副业、渔业，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规定。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阎红彦同志针对对云南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特点，特别注意采取经济手段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and 活跃山区的经济。他不只一次地说：“依靠给自己的小经济来改变落后的经济面貌是困难的，必须依靠党的领导，依靠正确的经济政策，依靠先进的流通关系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的指导，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商品率的提高”。为了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在他的积极主张下，省委制定了社员养猪“吃一半卖一半”的政策和对大牲畜、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合理养、卖、吃的政策，即按照牲畜发展的自然规律，实行积极的合理的淘汰，以增加集体和社员收入，改善群众生活，提高群众饲养牲畜的积极性。这对于云南畜牧业的大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全省大牲畜由一九六〇年的一千五百二十二头，发展到一九六五年的二千二百多万头，按农业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有一头多。畜牧业收入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当时，在全国畜牧业收入比重中也是比较高的。特别是猪和羊增长很快，由一九六〇年的五百五十多万头猛增到一九六五年的九百六十多万头；羊由一九六〇年的四百多万只增加到一九六五年的六百八十多万只。由于采取了合理养、卖、吃的政策，大大提高了羊的商品率，一九六六年的羊收购量达到六十三万只，比一九六一年的一万二万五千只增加四倍多。为了发展林业，省委作出了山林分级管理的决定，明确划分了森林的所有制，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因此，造林面积逐年大幅度增长，特别是经济林木发展很快，由一九六二年的三十八万，发展到一九六四年的一百七十四万亩，有些地方建起了万亩茶园、千亩茶园。林副产品如油桐籽、油茶籽、乌柏籽大幅度增长，种桑、种蓖麻、种竹成

为普遍现象。当时，在阎红彦同志倡议下，省委还成立了山区工作委员会，派出了一千多人的山区工作队，增加了扶植山区生产的专门经费。省委还试行了高山、分散山区以畜产品、土特产品抵交公余粮的政策，以利于因地制宜发展山区生产和促进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样，穷乡僻壤的大量畜产品以及禽、蛋、土特产品下山了，对于改变山区落后面貌起了积极作用。

阎红彦同志从云南实际出发所提出的这些建议，具体落实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可以这样说，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云南战胜三年困难，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步伐比较快的根本原因。但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党羽，却诬蔑阎红彦同志提出的这些实事求是的方针是什么“山区特殊论”，“流通决定论”，“这不是‘山区特殊论’，也不是‘流通决定论’，而是从云南的实际出发，从山区的特点出发；是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依靠党的经济政策，高速度地全面地发展云南的生产。在云南，不重视山区，就是脱离云南的实际，‘全面发展生产’就是一句空话。而如果不采取经济的办法，不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是不可能高速度发展生产的。这是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林彪、“四人帮”的诬蔑，只能说明他们的反动和愚蠢，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因地制宜的原则是正确的。

(三)

云南有二十一个少数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云南有近四千公里的国防线，在国防线附近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有十三个民族跨境而居。在云南，坚决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对于边疆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国防的巩固，都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阎红彦同志主持云南省委工作期间，对于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十分坚决。他能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积极地解决民族问题。

一九五八年，由于一度脱离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现了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一九五七年，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刚刚完成土改，就开始了合作化；到了一九五八年，有人又提出了所谓“一步登天”(由互助组、初级社一步实现人民公社化)和“反三论”(反特殊论、落后论、条件论)的主张。这种不讲条件、不分民族的过“左”行为，引起了动荡不安，出现了人口外流、生产下降。一九五九年以后，在阎红彦同志的主持下，逐步调整了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制订了贯彻了一系列适合边疆民族地区具体情况的政策，如肯定边疆当时的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一般办单一民族社，允许社员长期保留自留地、零星果、小鱼塘，允许社员养猪马，允许苗族有磨塘地和瑶族有蓝靛地，允许回族有自留牛、羊，等等。这样做了以后，边疆迅速恢复了稳定，外流人口逐渐返回。到一九六五年，阎红彦同志根据毛主席对新疆工作的指示，亲自到边疆地区的孟连、沧源、耿马等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后，又进一步提出了从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上帮助少数民族的具体措施。当时，云南边疆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山区，经济、文化、教育相当落后，不仅保持着“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法，而且文化水平低，宗教迷信、陈规陋习还相当严重。有的合作社没有会计，学技术不识字，甚至生活方式也非常落后，饭菜简单，衣着简陋，不讲卫生。阎红彦同志提出，要在边疆民族地区传播先进科学技术，提倡学文化、讲卫生，发展商品经济。为此，组织了民族工作队，提出了扶植民族地区发展生产的专款，采取办学习班、训练班等多种形式，在民族地区扶植生产、传授技术，甚至传授农业生产多样化的先进知识。有些工作是从解决盖住房、磨豆腐、做酱菜、提倡刷牙、洗脸、盖被子开始的。这些措施受到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他们至今念念不忘。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切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的具体政策和措施，边疆民族地区的生产面貌和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合作社逐步巩固壮大，入社农户逐步增加，生产逐年上升。到一九六四年，边疆地区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十七亿一千万斤，大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对这些从实际出发实行的政策，横加污蔑，胡说这是“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文化决定论”，向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脸上抹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是最好的见证。这根本不是什么“边疆特殊论”，而是承认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只有承认这种特殊性，才能引导边疆少数民族走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这也不是什么“民族落后论”、“文化决定论”，而是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出发，迅速改变这种落后状态的正确措施。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实践证明，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生产发展了，集体经济巩固了，边疆稳定了，民族团结了。而在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下的边疆民族地区则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否认边疆民族地区有特殊性，否认民族之间的差别，鼓吹什么“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不存在了”、“民族差别消失了”，“反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不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云南边疆大搞反动的‘划线站队”、“政治边防”，残酷迫害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和贫下中农。他们在生产上大肆搞瞎指挥，“一刀切”。林彪、“四人帮”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边疆的稳定，民族的团结，集体的生产，再一次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外流发生了，集体经济被削弱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大大下降了。

(四)

我们云南省委中和阎红彦同志共同工作过的同志，都深深感到：他有一种敢于实事求是的果断气魄，有一种辩证地看问题的敏锐力。这是和他具有以群众利益为重，敢于对党、对人民负责，不怕担风险的崇高精神密切不可分的。当一九五八年刮“五风”时，阎红彦同志还在四川工作，当时有一股很大的“浮夸风”，谎报产量十分严重，如果谁加以怀疑，就会被诬蔑为“右倾”。阎红彦同志不但相信什么亩产万斤粮，还亲自去揭露这种“浮夸风”。他曾经亲去工作人员到现场，亲自验收过秤，当场戳穿这种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他常说：“要敢于负责，敢于坚持原则。什么是原则？合乎群众利益，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的原则。”正是由于心里装着人民的利益，他不哗众取宠，也不强暴强，不顾个人得失，能够正视实际，敢于从实际出发。

有这样两件事实，使我们永远不能忘怀。一件是，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正当林彪大肆鼓吹“句句照办”、“立竿见影”，并且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时候，阎红彦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多次提出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照抄照转照办”，并要有关部门把这篇文章翻印供干部阅读。他反复讲解《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同志的几段话：“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指示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执行是最不对的。”“盲目地执行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革命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必须洗刷唯心精神”，“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根据毛泽东同志《反对本本主义》的精神，阎红彦同志还提议在《云南日报》上展开“反对‘照抄照转照办’”的讨论。《云南日报》从一九六五年十月开始，辟出专栏，以《怎样正确执行上级的指示》为题目，展开了讨论，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共刊出了三十期、文章一百多篇。阎红彦同志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大讲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照抄照转照办”，是以无畏的精神向林彪进行了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对林彪贩卖的“天才论”、“奴隶主义”和形而上学、唯心论的一次愤怒讨伐。

另一件事是，到了一九六六年初期，正当林彪鼓吹“高举”、“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时候，阎红彦同志在保山专区主持召开了全省地委书记会议，用毛泽东思想总结保山大批办样板田的经验、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和开展多种经营的经验，以促进当年农业大丰收。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带上一带”(带毛泽东选集，一把锄头，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的口号，意思是把党的挂帅落到实处实际行动上，落实到生产上，落实到群众中。省委把这个口号作为当时全省的行动方针，并为此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社论。

这两件事都是针对林彪的。我们可以从中间清楚地看出，阎红彦同志是何等地坚强勇敢，何等地仇恨唯心论、形而上学，又是何等勇敢地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无畏才能真正实事求是。

仅仅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林彪、“四人帮”如此仇视阎红彦同志，如此疯狂地迫害他。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晚，在黑色风暴刮起来的时候，陈伯达亲自出马以势压人，但阎红彦同志刚正不阿，在电话上愤怒地宣告说：“我就不承认你们代表中央！”林彪、“四人帮”仇恨所有的老干部，尤其是仇恨一切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老干部，因为他们才是林彪、“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

(五)

二十八年来的，云南的生产建设走了一个“山”字形，两个马鞍形。从云南解放那一天起，革命和生产都是迅猛向前发展的，到一九五八年以后，出现了三年暂时停顿，生产跌下来了。经过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落实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生产又逐步上升，到一九六六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以后的十年，在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下，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云南的粮食被夺被抢被他们折腾光了，粮食由调出变为调入，市场紧缺，供应不足，人民遭殃。一九六六年十月，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后，中央调整、加强了省委领导班子，开展了揭批“四人帮”运动，摧毁了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云南又重新高速度地前进。在这三起两落的过程中，一切人、一切事都经过了检验。实践证明：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出发点——实事求是原则的时候，云南的革命和建设就胜利、就前进；凡是背离、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时候，革命和建设就失败、就倒退。黑白分明，是非清楚。历史是无情的，林彪、“四人帮”强加给阎红彦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在全省人民面前都一一地被推倒了！

今天，当我们纪念阎红彦同志的时候，遗憾的是，他没能和我们一起来亲眼目睹林彪、“四人帮”的覆灭。但是，我们可以告慰阎红彦同志的是：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云南正在大治的道路上勇前猛进。全省人民决心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召，坚决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迅速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我们一定要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才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的谆谆教导，学习阎红彦同志对党和对人民负责的高尚品质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安息吧！阎红彦同志！





# 東柬革命軍在各戰場繼續打擊越寇

新华社北京二月九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柬埔寨革命军继续在各战场打击越南侵略军，不断取得胜利。

在茶胶—贡布战场，二月五日，柬埔寨革命军在三号公路上打击越南侵略军，消灭敌人七十名，击毁敌人坦克十六辆，缴获苏制坦克三辆和各种武器四十三件。同一天，柬埔寨革命军在占卡等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八十五名，缴获各种武器五十多件。二月六日，柬埔寨革命军袭击了占卡那的敌人，消灭敌人二十四名，击毁军车一辆，缴获武器七件。二月四日和五日，柬埔寨革命军还在贡布市周围打击越南侵略军，消灭敌人二十七名，缴获各种武器十三件。

在桔井战场，二月二日，柬埔寨革命军在十三号公路上袭击了敌人的一个车队，击毁敌人军车十六辆，全部消灭了车上的敌人。同一天，柬埔寨革命军还在桔井到曼多基里路段上袭击越南侵略军，打死敌人六名。

在二十六号公路战场，二月五日，柬埔寨革命军在巴登击毁和击伤敌军军车十六辆，消灭了车上的敌人。二月六日，柬埔寨革命军又袭击越寇，当被击毙四十多人，打伤一批，击毁军车一辆。

在磅清扬战场，二月五日和六日，革命军袭击了奥邦波列和响波比的越寇，当被击毙四十多人，打伤一批，击毁军车一辆。

在暹粒—奥多棉吉战场，二月五日，柬埔寨革命军在奥普塞截击敌人，打死五十人，打伤多人。

在巴萨河战场，柬埔寨革命军二月七日至八日，在巴萨河沿岸打击越南侵略军，打死敌人十四名，缴获各种枪八支。

在磅诺战场，柬埔寨革命军二月三日在磅诺市场以北袭

击外出的越南侵略军，当场打死敌人十名，打伤一批。

在马德望战场，柬埔寨革命军二月五日打击从马德望市场前往马德望市场以南和以东的越南侵略军，打死敌人五十名，活捉敌人一名，缴获武器二十五件。

新华社北京二月九日电 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的一篇评论指出，越南侵略者在柬埔寨面临重重困难。

评论说，在柬埔寨战场上，从表面上看，越南侵略者包括哥本哈在内的大片柬埔寨国土，但是从本质上讲，越寇在侵略柬埔寨战场上越陷越深。由于柬埔寨军民广泛出击，切断运输线，越南侵略军的武器和弹药供应非常困难。

评论说，具有长期斗争传统的柬埔寨各族人民绝不向越南侵略者屈服投降，越寇的侵略进攻遭到了柬埔寨各族人民的仇恨烈火，促使他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打击越南侵略者。

评论说，越南侵略者在入侵柬埔寨以后，妄想掠夺柬埔寨丰富的资源、特别是水稻，来养活它的侵略军。但是，柬埔寨军民不断打击冒险外出抢掠水稻的越寇，使它的阴谋不能得逞。目前，越南侵略军正面临缺乏粮食等困难。



走进了死胡同

## 一些马列党和组织痛斥苏联支持越南侵略

### 柬人民正义事业必胜 侵略者必被粉碎

据新华社利马二月八日电 据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红色祖国》最近一期报道，秘鲁共产党不久前分别与阿根廷共产党（马列）、瑞典共产党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越南在苏联唆使下发动对民主柬埔寨的侵略。

秘鲁共产党与阿根廷共产党（马列）的联合声明指出，“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的侵略，是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恶意的唆使下发动的”，越南侵略者“必将被柬埔寨人民所粉碎”。

秘鲁共产党和瑞典共产党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坚决支持柬埔寨为反对侵略战争和苏联支持的越南地区扩张主义而展开的斗争。

据新华社北京二月三日电 美国《号角》周刊最近一期刊

登美国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向民主柬埔寨领导人——波尔布特主席、英萨利副主席、乔森潘主席发出的支持声明，表示“完全支持柬埔寨人民进行反对越南在民主柬埔寨进行的侵略而作出的努力”。

声明指出：“柬埔寨人民和柬埔寨革命军目前进行的抗战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产生直接的影响。柬埔寨人民的英勇斗争应该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民的支持和同情。”

据新华社北京二月六日电 土耳其工人党和葡萄牙共产党（马列）在安卡拉举行会谈后，于二月一日发表一项联合声明，谴责越南人侵略柬埔寨，并声明：“两党强烈谴责越南领导人发动对民主柬埔寨的侵略，扼杀社会主义的行径。我们

## 菲律宾报纸撰文强调指出

### 警惕苏联通过侵柬向东南亚扩张

新华社马尼拉二月六日电 菲律宾《今日商报》二月六日发表文章指出，菲律宾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应当警惕苏联象它在非洲所干的那样，对东南亚地区进行侵略和干涉。

文章说，目前苏联和古巴的顾问站在越南侵略者一边反对柬埔寨，给菲律宾人敲起了警钟。文章说：“在非洲大陆上，‘解放战争’为幌子的苏联干涉的形式众所周知，以专家和顾问为先锋，然后被扮成志愿人员的古巴正规部队大规模地空运出来，以完成霸权主义者的包围。”

文章揭露，在柬埔寨的几条战线上已经证明苏联和古巴顾问采取一系列行动，有的甚至被杀。文章强调指出，警惕苏联和古巴在非洲所干的那样，通过侵略柬埔寨向东南亚扩张。

新华社曼谷二月三日电 泰国一位政府人士说，越南一手炮制的边境傀儡政权最近突然宣布，将无条件让泰国船舶进入柬埔寨南海诸岛。他说：“这企图拉拢泰国和东盟其它国家支持它的一个阴谋。”

据泰国《中华日报》今天报道，这位人士说：“当各种美丽的谎言无法骗东盟国家的时，越南和古巴傀儡又变换手法，企图利用它们。”

他说，金边傀儡政权在宣布允许泰国船舶进入柬埔寨领海后的第二天，又宣称“愿与泰国谈判边界问题”。这里同样包藏着侵略者的用心。

他指出：“泰国应提高警惕，切勿上当。”

## 高举民族民主爱国统一战线旗帜

（上接第一版）

柬埔寨革命和各国革命经验证明，在全民族的抗日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在正确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是取得胜利的一个法宝。在这条统一战线中，必须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同时也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敌救亡的队伍。工农占人口的多数，是主力军，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战争的情况下，同样要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把他们爱国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组织起来。同时还必须团结一切爱国的政治力量，共同肩负起越南祖国的大使命。

在统一战线中，爱国知识分子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柬埔寨广大的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的，他们在今后斗争中将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也有同样的经验。当时，我们党采取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壮大了革命力量，发展了革命的统一战线。他们奔赴抗敌前线和各个根据地，参加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工作，宣传和组织群众，为民族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目前，柬埔寨的爱国知识分子正在投身于新的民族斗争，他们必将为柬埔寨的抗越卫国战争作出积极的贡献。

民族、民主、爱国统一战线是非常广泛的，参加到这一统一战线的人越多越好。统一战线越广泛，力量就越深厚。不仅要有工农，要有知识分子，而且还要团结一切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人士，团结各种愿意抗击越南侵略的力量。民主柬埔寨政府号召国内外全体柬埔寨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抗击越南侵略的斗争，正是表达了一切爱国力量的共同心愿。只要正确地按照民族、民主、爱国统一战线的方针办事，并采取各项相应的政策，柬埔寨人民的抗越卫国斗争就一定能够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不断地取得胜利。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把老百姓发动起来，就能陷敌于汪洋大海，就能使革命军队克服武器弹药方面的缺陷和其他一切困难，得到强大的支援。因此，柬埔寨革命军队同广大民众的团结，是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最可靠的基础。柬埔寨过去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伟大的真理。

柬埔寨人民对于自己的正义斗争是充满信心的。越南侵略者虽然侵占了柬埔寨的许多城镇，但这只能预示着侵略者失败的开始。目前越南侵略军战线很长、兵力分散，后方空虚，供应匮乏，已陷入极端的困境。越南侵略军的长期抗战，越南侵略者必将从战略上的主动转为被动，从强向弱转化，而柬埔寨人民将会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弱转强。柬埔寨人民只要坚持长期的不屈不挠的人民战争，就一定能够打败越南侵略者，取得抗越卫国战争的胜利。

柬埔寨的抗越卫国事业是正义的，它不仅在国内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而且也在国际上已得到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谴责越南的侵略、要求越南侵略军撤出柬埔寨的呼声遍及全世界。中国人民坚决站在被侵略的柬埔寨人民一边，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及弱小民族的侵略和奴役，并将给予艰苦奋战的柬埔寨人民以多方面的援助。我们相信，越南侵略军被赶出柬埔寨神圣国土的日子一定会到来，一个独立的、主权的、领土完整的柬埔寨必将屹立在湄公河畔，柬埔寨人民必将荡清越南侵略者所留下的一切耻辱，使古老的吴哥文化重放光芒。

# 看,越南小霸是怎样步步侵略柬埔寨的

## 公敬之

最近，越南在苏联的支持和怂恿下，公然武装侵略民主柬埔寨，撕下了“不结盟”和“社会主义”的招牌，这是越南当局长期以来为实现“印度支那”帝国和称霸东南亚的罪恶行径的大暴露，是地区霸权主义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一场殖民战争。

早在二一九三〇年，越南就制订了“印度支那联邦”战略，在印支地区，开始推行“一个党的领导下只有一个国家、一个人民”的政策。一九七五年抗美战争胜利前，越南就处心积虑地为实现这个战略准备条件，对柬埔寨进行了大量的罪恶活动。据揭露，越南曾在柬埔寨的土地上，公然另外制造了“一个党”、“一个政权”和一个“军队”，以此作为反对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的工具。越共中央委员、《人民报》总编辑黄吉去年同法国记者谈到柬、柬关系时，公然宣扬越南当局支持“反对（民主柬埔寨）那个政权的人”，并承认越南当局早在七十年代初就曾图谋对柬埔寨领导人下手。

众所周知，抗美战争期间，越南当局要求在北越和柬埔寨的领土上建立一条通往越南南方的交通线，并在靠近越南边境的柬埔寨领土上建立基地，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志明小道”和“越共庇护所”。当时的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在南方解放阵线一再声明承认和保证越南民主柬埔寨在边界线内的领土完整和越南南方柬埔寨之间的边界线。这些基地和交通线对支援柬埔寨南方的抗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同时柬埔寨为此承受了极大的民族灾难。

抗美战争结束后，越南当局头脸膨胀，自封为东南亚头号军事大国，力图在“发展印度支那三带特殊关系”的新幌子下控制老挝和柬埔寨，实现“印度支那联邦”的总计划。它用五万大军和成千的大炮轰向，老挝企图进行了全面控制。对柬埔寨，它企图以炮制。在一九五五年柬埔寨全国解放后，越南仍然要求柬埔寨政府与它实行“共同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提出所谓搞清“越南联合经济”和“海上共同经济”，还要柬埔寨同它一起反对东南亚国家联盟。在柬埔寨越南的霸权地位维护本土主权，强烈反对越南的霸权主义政策后，柬埔寨就成了越南实现“印度支那联邦”并进而称霸东南亚的障碍。于是，越南当局变本加厉地对柬埔寨采取武装侵略和政治颠覆反革命两手，必欲把柬埔寨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而后快。

越南当局不仅想把侵略地把它一部分军队赖在柬埔寨不走，而且背信弃义地否定了过去作出的承认并尊重柬埔寨现有边界内的领土完整的诺言，于一九七六年六月派兵侵占柬埔寨的威岛，并以作为开端运用武力侵犯柬埔寨的领土。更有甚者，在一九七六年越南和柬埔寨的谈判中，越南当局向柬埔寨提出重新划定两国边界以便吞并柬埔寨大片领海和领土的无理要求。同时，越南当局还干涉柬埔寨内政，进行了一系列阴谋颠覆活动，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一九七六年

四月、一九七六年九月、一九七七年四月和一九七七年九月多次企图制造政变，妄图从内部瓦解新生的民主柬埔寨。但是这些无耻勾当，接连遭到了失败。

越南当局的领土欲望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满足，小规模的武力侵犯也所获甚微，阴谋颠覆未得逞，于是它便诉诸庞大的军事力量，犹如饿虎扑食似的想一口吞掉柬埔寨。从一九七七年九月起，越南当局派出大批军队，一次又一次地越过边界，向柬埔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一九七七年，越南当局集中了更多的兵力，对柬埔寨展开了第一次战略性的武装入侵，妄图用“速战速决”一举拿下柬埔寨。柬埔寨军民奋起抵抗，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越南的侵略。越南当局随后失去了野心，并未因而收敛。在去年十二月以前，它一面用武力继续不断入侵柬埔寨，一面调兵遣将，作为扩大柬埔寨战争的准备。去年十二月三日，它又用刺刀制造了一个叫“柬埔寨民族民主爱国统一战线”的傀儡组织，妄图把它对柬埔寨的侵略说成是柬埔寨的“内部事务”。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多达十万人以上的越南正规军，打着傀儡组织的旗号，兵分数路对柬埔寨发动了全面的最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越南侵略者在占领金边后，立即拼凑了一个所谓“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的傀儡政府，并由它和苏联带头予以“承认”。

越南当局如此肆无忌惮地侵略一个主权国家，是由于得到了苏联的全

## 国际短评



